

從文人到國士

對連雅堂的觀察

● 蔡相輝

一、前言

連橫，字武公，號雅堂（雅棠），又號劍花，福建省台灣府台灣縣寧南坊馬兵營（今台南市中區）人，生於清光緒四年（西元一八七八），卒於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享年五十九。其一生經歷清朝統治、乙未割台、日人竊據；並卒於祖國大陸，經歷時變之劇急，罕見其匹。所接受的教育，為中國古代之科舉制式教育，長大後卻淪為異族日本國民，人生追求之目標與前途頓失依倚，實人情之所難堪。成家後，就業於日人所辦報社，言論依違取捨，更費思量。處此衰亂之世，立身行事，倍加艱難。雅堂處其間，卻堅苦自勵，網羅中外史料，創為「台灣通史」，以明台灣非日本人之台灣，復從語言學上探索台灣文化之根源，撰成「台灣語典」，呼籲各界提倡外，更直指「台灣之語，出自漳泉，而漳泉之語，傳自中國。」「高深優雅，有非庸俗之所能明；且有出於周秦之際，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。」其苦心孤詣，非知其世，實不足以論其人。台灣光復後，雅堂生平事蹟，遂為學界所重

，為文考述其生平、表彰其志節、闡發其思想者不乏其人，較著者有楊雲萍、吳相湘、毛一波、李雲漢、曾迺碩、王啟宗等，鄭喜夫更以數年心力，編撰「連雅堂先生年譜」行世。雅堂生前事蹟，除文獻不足徵者外，略已大白於世。本文參酌相關史料，就家庭背景、求學與師友、職業與志業、思想與著述等方面來觀察連雅堂，掛一漏萬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二、文人氣息濃厚的家庭背景

雅堂先世為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人，其六世祖「興位」，於清康熙中葉移居台灣縣寧南坊。「寧南坊」是明鄭時代開闢為居商賈之街衢，也是清代台灣最繁榮之鬧區，連氏所居「馬兵營」，雖非最要區，若無貲力，也無能相宅於此，故可推斷雅堂先世，非商則賈。數傳之間，家業也迭有興落。

清道光、咸豐年間，西力東漸，雅堂祖父長瑞乘時奮起，家業漸興，除自有園圃之外，並於

府城坊橋頭開一「芳蘭號」煙舖，收入頗豐。雅堂父得政，克紹箕裘，光大家業，置產頗多；且以家貲富饒，凡天災、兵燹、恤孤、救貧、助學等慈善及公益事業，常一擲千金，毫無吝嗇。以此，交遊十分廣闊。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，福建台灣採訪「孝友」，連得政以「孝友端人，事蹟確鑿」，被列狀上聞。巡撫邵友濂並為題請旌表。

連得政雖非科場出身，也雅好讀書，對子弟教育十分重視，如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購得舉人吳尚濬之別墅「吳園」，即以爲子侄讀書處，平居復常對雅堂等講述春秋戰國書、三國演義等忠義故事，家中充滿文學氣息。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，雅堂仲兄德裕、從兄重家同入台灣縣學爲生員，士大夫過往者衆，連氏亦竭誠款待。謂連氏於光緒年間已晉身士紳階層，應不爲過。

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年二十，與沈鴻傑先生長女少雲完婚，少雲時年二十四。鴻傑少習海，貿易日本及東南亞，復與英、德商合作，採辦洋貨分售南北，而以台貨外銷西洋。嗣又

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，後又經營樟腦煉製，外銷額每年達數萬擔，獲利數十萬金，為當時豪商之一。雅堂婚後即寓夫人家，與夫人弟伯齡年相若，交其篤，平居無事，偶亦走馬章台，「幾度相攜入醉鄉，酒籌歌板少年場」，「章台走馬柳絲長，慘綠年華竟擅場」，即為此一階段生活之寫照。

雅堂兄弟五人，然其三兄、五弟早殤，故實為季子，倍受父母疼愛，幼時即恒隨侍父親往遊各地，長大亦不必為家計操心，故其性情溫文浪漫，剛毅果斷稍有不足。他日主持「台南新報」漢文部時，為開「赤城花榜」，遴選十美；於「赤城花榜」冠軍李蓮卿病歿，為賦七言絕句十首，集成「悼蓮集」一帙；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日人欲在臺灣推行「鴉片漸禁」政策，與台民主張「全面禁絕」相牴觸，三月二日，「台灣日日新報」漢文版，刊出以雅堂署名之意見書一篇，題為「台灣阿片特許問題」，為日人政策作疏導，引起台人大譁，競相攻擊。雅堂對此文究否為其所作，竟亦不加辯解，皆為雅堂個性之所致。

三、求學與師友

學問根源來自父兄

民國以前之教育體系，係針對政府科舉用人而設，地方政府雖有縣學、府學之設置，但其層次已高，能入學者，多已讀畢四書一經，能賦詩論文。入學後，也多在詩文切磋致力，且其名額

甚少，故學校之實質作用是在培養地區性新一代社會領導階層，讓他們得以參加科舉考試，進入管理國家政治之官僚體系而已，其性質與今日之國民教育迥然不同。因而擇師就傅，即為讀書人最重要之事。

雅堂第一位老師為魏一經，魏氏台灣縣人，為宿儒，及門多俊逸之士，如其高足陳省三早在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三）即已高中進士。如此名師，似不必日為八歲小童親授入門科目，而僅於拜師破筆時，親為耳提面命一番而已。實際為雅堂啟蒙師者，似為其姊夫鄭夢蘭（鄭氏事蹟不詳）。至十三歲，雅堂又就傅於觀音亭街，但雅堂亦未曾提及師事何人，似乎雅堂受到老師影響不大。

推斷雅堂學問之根源，似來自父兄之教育。雅堂謂：「先君好讀春秋、戰國書及三國演義，所言多古忠義事，故余得之家教者甚大。」（過故居記）而其日後發奮撰「台灣通史」，更係彼十三歲之年，父得政購「台灣府志」授之，並告以「汝為台灣人，不可不知台灣事」所得之啟發。雅堂十五歲之年，其仲兄德裕（長雅堂六歲）從兄重家同考入縣學為生員，是兩人學問皆已有根柢，而雅堂十二歲至十八歲，皆從二兄攻讀，其所得應不亞於外出就傅。

此外，雅堂於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曾赴上海，入聖約翰大學攻俄文，然未幾，即奉母命歸台。此後即未曾再接受正式教育。因而論連雅堂之學問，仍以傳統科舉舊學為主，即以三字經、幼學瓊林、朱熹注本小學、四書、四史、

五經中之一經為其根基。

雅堂交遊甚廣，而交稱莫逆，或為道義交，或於雅堂思想有所影響者，則有沈伯齡，林翰存、林朝崧、梁啟超、胡南溟、張溥泉等人。雅堂性情真摯，情感率形於文墨，摯友殤，為慟哭流涕，友不義，亦凜然為文抨擊。

沈伯齡為雅堂夫人長弟，長雅堂二歲。雅堂婚後即寓居夫人家，故與伯齡交至篤。沈家家業龐大，伯齡復奮發，有與友人合設台灣實業社之計劃，故酬酢頗多，為奏樓章台之嬌客。雅堂常與相攜入醉鄉，遂遍識花國名妓，旋於台南新報開「赤城花榜」，遴選十美，即以此而來。惜伯齡於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以二十五英年病卒。伯齡卒後，雅堂為撰「哭沈少鶴」七絕八首，其末二首云：

「論交肝膽凜秋霜，況復深情在渭陽；一語告君如皦日，事親教子我擔當。」

「朝夕摳衣上影堂，一回思感一悲傷；年年擬向墳頭哭，絮酒親澆引白揚。」

用情之深，於此可見。惜伯齡早折，苟伯齡長壽，家業不衰，雅堂日後生活不陷窮困，其理想與抱負，或更得推展。

不以私交而昧真理

林翰存字景商，原籍福建安溪。其祖在台經營茶、樟腦、金礦等業，遂寄籍台灣淡水。翰存生長於台，至乙未割台，乃返原籍安溪，與雅堂為總角交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八月，雅堂至福州應是年補行庚子、辛丑恩、正併科經濟



①連雅堂全家合影。

②民前二年羅山吟社大會，第二排左起第四人為連雅堂。



特科鄉試。試畢，雅堂滯留廈門，主鷹江報筆政，與轄存（時寓鼓浪嶼）常相往來。轄存早薦經濟特科，嘗上書言變法，光緒帝嘉納之，以郎中用，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英國股章京。戊戌政變，避居日本東京，旋歸國，改道員，簽發江蘇，改調廣東，復為福建諮議局議員、資政院補缺議員等，民國成立後，仍被選為國會議員。連雅堂之民族意識及維新思想，皆受其啟迪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雅堂有留別林景商七絕四首，其二云：「舉杯看劍快論文，旗鼓相當共策勳。如此江山如此恨，不堪回首北遙雲。」其四云：「合群作氣挽洪鈞，保種興王起劫塵。我輩頭顱原不惜，共磨熱刀事維新。」雅堂不啻已由慘少年成長為憂時憂國之士。而致之者，轄存之功也。

林朝崧，字俊堂，號癡仙，台中霧峯人，台灣縣廩生，文名宿著，為台中文壇祭酒，曾與其侄資修、賴紹堯等倡結詩社「櫟社」於霧峯林朝崧與連雅堂係由文字訂交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朝崧贈雅堂七律二首，云：

「伊川被髮久為戎，望絕英雄草莽中，革命空談華盛頓，招魂難起鄭成功。霸才無主誰青眼，詩卷哀時有變風；擊碎唾壺歌當哭，知君應不為途窮。」「才華縱橫策治安，江湖淪落一儒冠；神交數載憑文字，晤語移時吐膽肝。熱血少年消耗易，頽風故國挽回難；願君好繼龍門史，藏向名山後代看。」

朝崧對雅堂才華之推許與期望之高，由此可見。

見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以後數年，雅堂任林家「合春號」秘書，移居台中，與林朝崧、林獻堂等交往甚密。朝崧嘗謂雅堂：「吾輩論交當為生死之友，次為道義之友，次為文字之友，最下乃勢力爾。」（雅堂文集卷二林癡仙哀辭）其交友，必推心置腹，故深為友朋愛戴。是年冬，雅堂與櫟社成員筆戰旬日，即賴朝崧調停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春，雅堂並應朝崧邀，入盟櫟社。惜朝崧於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以四十一壯年病逝，雅堂少一能愛護他，幫他調和各界之友，與櫟社盟友往來漸疏。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，以「台灣通史著者連雅堂」名，發表「台灣鴉片特許問題」意見書一篇，贊同日本台灣總督府所欲施行之鴉片漸禁政策，輿論大嘩。櫟社成員則藉故將雅堂除名，終不全朋友之義也。

梁啟超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廣東新會人，世代書香，父、祖皆有功名，十七歲中廣東省舉人第八名，後師事康有為。光緒二十年後與康力倡維新，維新失敗後復主保皇，與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革命運動相雄長。當清社未屋，台灣土子亟盼祖國能奮發圖強，並將希望寄託於康、梁身上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二月，梁啟超與長女令嫻、湯淑，應林獻堂之邀來台訪問，約半月之久。雅堂時為林家秘書，陪與酬酢十餘日，啟超並書中堂兩幅贈之，其二云：

「明知此是傷心地，亦到維舟首重回；七年中多少事，春風樓下晚濤哀。」啟超來，與會諸人十分振奮，對台灣未來紛

紛問計。啟超輒勉諸人「勿以文人終身」，即當效法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之襟懷，不可以詩酒吟唱為已足。雅堂次年之有大陸行，致力保存文獻，著「台灣語典」保存宗邦文化，受梁氏啟迪者不少。其後，啟超為袁世凱延攬，為司法總長。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，並撤銷國民黨籍國會議員三百五十人資格，而梁啟超為之副署。雅堂即對梁氏有正義之批評，云：「取消國民黨議員之命令，其副署者所謂第一流之內閣，而梁啟超又為司法總長者也。啟超雅負時望，以法治國自期許，乃見此破壞約法之命令，欣然從之，則其所自期許者何在？夫憲政之國，立法、司法並行不悖，今乃為行政所破壞，則法之精神亡矣！精神既亡，則民何託？故為司法總長者，而稍有人心，拒之可也；爭之可也；則不能而去之可也。而啟超乃任其蹂躪，其能免於春秋之責乎？」（大陸游記卷二）而不為趨炎附勢之語，可見其於民主憲政有其真知灼見，不以私交而昧真理。

異族之下謹慎行事

胡南溟，名殿鵬，字子程，以字行，台灣縣人，前清廩生，長雅堂十二歲，為日據時期台灣三大詩人之一。南溟與雅堂訂交，約在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，是年南溟入「台南新報社」任記者，與雅堂共事，交相契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雅堂攜眷赴廈門，與蔡佩香等人創辦「福建日日新聞」，自任主筆。旋以筆政繁劇，遂挽溟赴廈佐之，至次年該報結束乃止，兩人之



①連雅堂（後排中）與南社社友合影。

②連雅堂（前排右五）與台灣文化協會開辦的夏季學校學員合影。



交愈篤，後南溟返台，任「全台報」記者，雅堂則重主台南新報社漢文部。其後雅堂移居台中，遠遊大陸、定居台北，交不少衰。因雅堂詩文確為當時之佼佼者，為全台之所厚望。但雅堂任事之單位，非日人經營之報社，即與日本官方關係密切之台商，故種種作為，難免多所瞻顧，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日本台灣總督安東貞美令各廳設筵張樂款待長壽者，雅堂為賦「慶養老典」五律一首歌之；又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「台灣通史」稿成，雅堂分請「台灣日日新報」主筆日人尾崎秀真、「台南新報」主筆日人西崎順太郎為其撰序，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更請日本台灣總督田健治郎、前任總督明石元二郎、台灣銀行頭職（董事長）等為書題詞；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等為書撰序；又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日本皇儲裕仁來台，台北當局令各界組武陣、藝閣遊行至其旅邸以供觀覽。雅堂用吳鳳故事，以「通事成仁」為題為林本源家作詩藝閣；用辜婦媽故事，以「節婦訓子」為題為辜顯榮作詩藝閣。雅堂此類行徑，看至至友胡南溟眼裡，真不勝痛惜。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雅堂將其十年來所為詩，集為「寧南詩草」，函請南溟為之作序，南溟遲遲不肯動筆，至次年四月，始復書云：「前書索序，遲遲未發，以兄多年交誼，又屬社友，未可突唐西施，弟之苦衷，難以道及。」（台灣詩薈第十八號）及發為序文，果對雅堂頗多諷勸，云：「寧南為台灣首善之區，三百年詩文充汗……近代卓越如連子，旗鼓驍壇，著作如林，其亦可謂三百年文獻中之秀者歟！然而海桑身世

，為時屈、為地屈、為名與利屈，則其人品、作品、詩品亦為一變，有心文獻者無不為連子惜，並為寧南人惜也……」（寧南詩草序）不久，南溟復致書雅堂，指陳學者病因，云：「聖學式微，半由史學；漢書以儒林、文苑分途，而文章無實學，大失文行四教之本旨……聖學微茫，學者病焉。」（台灣詩薈第二十一號）南溟直、諒、多聞，可謂為雅堂益友。

張繼，字溥泉，河北滄縣人，為革命黨之健

者。十八歲赴日留學，十九歲入早稻田專門學校習政治經濟，曾與秦力山、下田歌子等組織「興亞會」，主張中日兩國同時革命，具有世界性的政治眼光，對台灣狀況，極為注意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「台灣通史」刊行，雅堂以民國三年曾於北京向章炳麟多有所請益，遂呈贈一部。張繼於炳麟處見是書，歎為極有價值，屢欲得一部，置之座右，藉以懷先民，景慕鴻範。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初，雅堂創刊「台灣詩薈」，寄贈張繼一份。張繼收後，除函謝外，並索閱「台灣通史」，雅堂旋再贈張氏「台灣通史」一部，並請將「大陸詩草」一冊轉陳章太炎。太炎閱後，謂：「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，異日當為之作台灣通史序。」（台灣詩薈第五號）故張繼與雅堂

，達十五年之久。台灣光復後，連震東迭膺重寄，復參贊決策，溯其根源，實為張繼啟之。

綜觀雅堂一生，交友不可謂不多，年輕時，往來多科名中人。亦曾醉心維新與保皇，大陸之遊以後乃漸有與革命黨人往來，但似未加入同盟會等革命團體，返臺後則間週旋於日人、御用紳士之間，而為諸友不諒。雅堂亦不加辯解，蓋處異族之下，行事不易，苟無出賣同胞之心，事情終有大白之日也。

四、職業與志業

全力維護台灣文獻

職業為謀生之資，可無分貴賤高低，志業則為人生理想，兩者常無法合而為一。雅堂生長在衰亂之清季，否則憑其資質、才華，應可在科舉中獵得功名，優游度過一生。

雅堂幼攻舉業，但命運弄人，十八歲之年，清廷割臺，無端變成異國之民，於心靈上之打擊，應為不小，幸清廷未視臺民為化外，使雅堂在二十五歲之年得一償宿願參加是年福建省舉辦之科舉。結果雅堂落第，也死了在場屋追求功名之心。

雅堂第一個從事的行業是新聞業。光緒二十五年五月，日人在臺南創辦「臺澎日報」，即延聘雅堂入該報社任漢文部主筆；次年「臺澎日報」與「新聞臺灣」合併，改組為「臺南新報」，仍由雅堂任主筆，至光緒二十八年赴福州應舉時離職，次年十月，再回臺任原職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日俄戰爭發生，雅堂憤清政不修，攜眷赴廈門，與臺南新報同僚蔡佩香等合創「福建日日新報」，並邀友人胡南溟往助，亟思有所作為，然在無強力財力支援下，報社頗不易維持。五月，外舅沈鴻傑逝世，雅堂回臺為經理喪事，至八月始畢。次年，報社即有財務不支現象，南洋方面派李竹癡至廈，商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報，但卒未成，雅堂不得已結束報務歸臺，復為臺南新報社主筆。至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春夏間，移家臺中，轉入「臺灣新聞社」漢文部，並兼霧峰林家所營商號秘書，至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遠遊大陸止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雅堂返臺，復入臺南新報社，並致力撰寫臺灣通史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雅堂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聘，為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文牘之秘書，舉家移居大稻埕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春，雅堂攜眷內渡，居杭州西湖，至次年春，北伐軍興，江南擾攘，乃重返臺北，並與黃潘萬合夥，於今延平北路經營「雅堂書局」，所售文具、圖書，全採購自大陸之著名書局，對日文字籍及日制文具，一概不賣。初時業績尚可，久則每況愈下，且無好轉之可能，二年後不得已停止營業。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春，雅堂再返臺南，旋應臺南新報社社長之邀，入主該報詩壇，日與詩友酬唱，至二十二年返大陸定居乃止。

雅堂一生任職，除漫遊大陸之數年及自營雅堂書局之兩年外，絕大部份時間均任職於日人所辦之臺南新報。臺南新報對雅堂也似最厚，隨時

歡迎雅堂，然揣其用心，仍為統治者籠絡士紳之策而已，乃終攜眷返國，免為異族利用。

雅堂在日本統治者之下任職，但仍未喪失其理想，即：撰著臺灣通史，讓臺灣人知道臺灣事；蒐集遺逸書籍、文物，保存鄉邦文獻；風揚詩學，以維民族精神於不墜；這三件事情，對日人欲同化臺灣都有延宕作用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，雅堂在臺南新報發表「臺灣詩界革新論」，反對非詩之「擊鉢吟」，引起臺中臺灣新聞記者陳瑚之氣憤，著論相駁，雙方筆仗十餘日，卒賴林朝崧出面調停。雅堂日後語及此事，曾為詩云：「廿世紀風潮翻地軸，千秋事業任天氏；劫殘國粹相謀保，尼父春秋痛獲麟。」即指明提倡詩學是在為日據下之臺灣保全舊文化。

民國十三年，雅堂創刊「臺灣詩薈」，亦云：「臺灣詩學，於今為盛，文運之延，賴此一線……且彝倫攸斁，漢學式微，教育未成，民德猶薄，徬徨歧路，昧其指歸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此又士大夫之恥也……臺灣文運之衰頹，藉是而起，此則不佞之職也。」（臺灣詩薈發刊序）此亦證明雅堂思想前後是一致的，他並親結「浪吟詩社」、「加盟「櫟社」、改創「南社」；擔任「桃園吟社」、大甲「蘅吟社」、宜蘭「登瀛吟社」盟員創刊詩報顧問；於文化協會台北支會講解詩學淵源等，對臺灣詩學之勃興有其卓越貢獻。

對於臺灣歷史文物的保存維護，雅堂也不遺餘力。日人據台後，逐步在各地推行都市更新計

劃，相對的，也拆掉許多深具意義的名蹟，雅堂遇有此類情形，必盡力維護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臺南市區改建，將竹子街、武館街、帽子街、十三舖、大井頭街等拓寬，改為一大馬街，議填大井。時雅堂在臺中任職，聞訊，即於臺南新報著論，力言此井為臺灣史蹟，應為保存。井因得不毀。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十二月，臺南第一公學校擴建，將毀法華寺北之「閒散石虎墓」，泥水匠某以告，雅堂聞訊，即率門人往視，斷定墓主為明鄭遺民，乃請於官，命工移其碣於法華寺之後園。又著論鼓吹，勸人對吉金真石，皆宜加保存。其用心確為良苦。

對蒐集臺灣各時期文獻，雅堂十分用心。民國十三年雅堂創刊「臺灣詩薈」，即自謂：「不佞之刊詩薈，厥有二義，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，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。」（臺灣詩薈第五號，詩薈餘墨。）雅堂也果不食言，民國十三年，蒐得清初夏琳所撰「閩海紀要」，以清代官書記述明鄭史事多誣曠之辭，此書為明鄭實錄，延平精忠大義、東都之經營譬劃可藉之流傳天壤，因之狂喜不已，立為整理梓行。十四年，復藉詩薈向各界徵求遺書，並編竣「臺灣叢刊」三十八種，其要者有：「黃宗羲，賜姓始末；鄭亦鄒，鄭成功傳；季麒光，臺灣雜記；郁永河，番境補遺；吳振臣，臺灣偶記；沈光文，沈氏庵詩抄；黃琬璫，台海使槎錄等，不少為焚餘之書，其於維護臺灣文獻之功，於日據時期不作第二人想。

綜觀雅堂一生，其職業與志業恰似火車之兩

軌，永無交點，人或不能自處，雅堂則甘之如飴，並自解其人生觀云：「余嘗覽古今詩人，大都侘傺無聊，淒涼身世，一不得志則悲憤填膺，窮愁抑鬱，自殘其身，至於短折，余甚哀之。顧余則不然，禍患之來，靜以鎮之；橫逆之施，柔以報之，而眷懷家國，憑弔河山，雖多迴腸盪氣之辭，不作道困言貧之語，故十年中未嘗有憂，未嘗有病。豈天之獨厚於余？蓋余之能全於天也。」（寧南詩草自序）

五、思想與著述

豪情壯志編撰通史

雅堂一生思想，隨著時代巨輪不斷的轉變。弱冠之年，也對政治充滿憧憬。光緒二十三年雅堂赴內地，其友應祥和題別詩中云：「懷才直可師韓、范，得志無難佐武周。」「問君何事客他鄉，答為功名去桑梓。」即充分顯示少年連雅堂，鑑於清室積弱，外患頻仍，想師法韓琦、范仲淹開幕府以禦西夏之雄心壯志。也因為雅堂對積弱的清廷，仍充滿幻想，所以五年後，他不惜花費金錢，赴廈門捐監，並赴福州參加是年的鄉試。

鄉試落第後，雅堂滯留廈門，主鷺江報筆政，並日與林略存往來。林略存曾上書言變法，為光緒帝嘉納，是為維新份子，雅堂受其影響，此後數年，多傾向維新與保皇。光緒三十二年，其留別林景商詩云：「舉杯看劍快論文，旗鼓相當共策勳，如此江山如此恨，不堪回首北遙雲。」

「合羣作氣挽洪鈞，保種興王起劫塵；我輩頭顱原不惜，共磨熱刀事維新。」其豪情壯志，錯落著力點，否則必可與少年汪兆銘的「飲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相媲美。

雅堂的保皇思想，一直維持到宣統三年梁啟超來臺時仍未變。啟超曾書中堂贈雅堂，其一云：「明知此是傷心地，亦到維舟首重回；十七年中多少事，春風樓下晚濤哀」落款云：「辛亥春遊臺過馬關之作，寫似，劍花當同茲懷抱。」

清朝固曾統治臺灣二百年，但就種族意識論，卻為僭竊明朝正朔之外來統治者，對漢人也未真有大恩大德，其統治基礎一旦崩潰，漢人皆不願再為效力。民國宣告成立，雅堂思想為之不變，並以祭告延平王鄭成功，其詞有：「滿人猖夏，禹域淪亡，落日荒濤，笑望天末……春秋之義，九世猶仇，楚國之殘，三戶可復。今者虜酋去位，南北共和，天命維新，發皇踵厲，維王有靈，其左右之！」（雅堂文集卷二，告延平郡王文）等語。

思想之轉變，雅堂將之化為具體的行為。民國元年六月，雅堂大陸之遊，住於上海華僑聯合會。一夕飲於勾欄，同應皆革命黨人，競行酒拳，其猜枚名詞多以封建官職為代號。有人強雅堂猜之，雅堂正色告之曰：「諸公以革命大義，覆異旗，創共和，廓清瑕穢矣，乃猶習舊時之枚猜，以一品、五魁聒余耳，余厭聞也。且此而不改，積惡長存，是仍驅一世之人心於利祿之途，其

為害豈勝言哉？」眾問然則如何而後可，則曰：「改之，改之而合於民主之制度。今以一品為統。」眾曰善。曰：「其次為兩院，為三權。」眾曰：「尤善，是共和國之神經也。」曰：「曰四民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國之本也。曰五族，國之所以成也。曰六法，法治之根源也。曰七曜，曰八星，世界之大同也。曰九鼎，今之武功章也，以武勵民，軍國之主義也。」眾曰：「至矣美矣，十為如何？」曰：「共和。以統一開其始，以共和收其終，豈非圓滿之國乎？」（大陸遊記卷一）

中國北伐統一以後，雅堂思想更明顯傾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認為三民主義已為新中國建設之大經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元旦，雅堂在「臺灣民報」第二百四十一號撰「思想統一論」，詳為解析，云：「遜清之季，政亂民窮，外患內憂，危亡日至，有識之士羣呼救國，或唱保皇，或謀立憲，而孫中山、黃克強、章太炎之流獨主革命，以為根本。中山又創造三民主義，號召黨徒，乘時而起，疊遭失敗，志不少衰……中山知革命之事，非僅可待國民黨也，當為全民運動，於是設學會、刊書報、事演講，極力宣傳三民主義，而農而士而商而兵，莫不深明其理，前呼後應，億兆一心。泊乎北伐告成，障礙已棄，而三民主義遂為新中國建設之大經。此則思想統一之效也。中山雖死，精神尚存，三民主義之運用進行，當有蓬蓬勃勃之氣象矣！」

民國二十年，雅堂命其獨子震東至大陸投奔張繼，雅堂在致張繼函中云：「今者南北統一，

偃武修文，黨國前途，發揚蹈厲，屬在下風，能不欣慰！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，現在臺灣從事報務。弟以宗邦建設，新政施行，命赴首都，投奔門下……弟僅此子，雅不欲其永居異域，長為化外之人，是以託諸左右。昔子胥在吳，寄子齊國，魯連蹈海，義不帝秦；況以軒黃之華胄，而為他族之賤奴，泣血椎心，其何能忍？」（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六日，青年戰士報）爲了不讓自己子孫再當異族之賤奴，不僅把自己理想寄託在統一、奮發、前景光明的大陸祖國，並命自己獨子去參與祖國之建設，此實爲雅堂思想經過數十年淬礪之結論。

雅堂之著述甚多，其生前引爲自豪，死後也爲各界重視者，自是「臺灣通史」。是書始於隋大業元年（六〇五）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，上下凡一千二百九十年，其體例略仿司馬遷史記，分別爲記四：開闢、建國、經營、獨立。志二十四：疆域、職官、戶役、田賦、度支、典禮、教育、刑法、軍備、外交、撫墾、城池、關徵、權賣、郵傳、糧運、鄉治、宗教、風俗、藝文、商務、工藝、農業、虞衡。列傳八：列傳一爲顏思齊、鄭芝龍及明鄭開闢台灣文武勳臣；列傳二爲清代武將施琅及抗清人物吳球、劉却、朱一貴等傳；列傳三爲王世傑、吳鳳等清代開拓人物及抗清人物林爽文、平定林爽文事件的清將福康安、楊廷理等人傳；列傳四爲清中葉海寇列傳及平定海寇之王得祿等人傳；列傳五爲同治、光緒年間抗清、平定事件相關人物戴潮春、林文察、沈葆楨、劉銘傳等人傳；列傳六則爲循吏、流寓、鄉賢

、文苑；列傳七爲孝義、勇士、貨殖、列女；列傳八爲臺灣民主國之邱逢甲、唐景崧、劉永福等人傳。並有「延平郡王世系表」等一百零一表散在各志中。

此書之以「通史」爲名，是因內容上溯自秦漢有史之始，下迄乙未割臺，已涵蓋全部臺灣歷史時期。雅堂復認爲國以民爲本，無民不足以立國，但前人作史，多詳禮、樂、兵、刑，而於民生之豐蓄、民德之隆污，每置缺如，故內容多重鄉治以下之民事。

「臺灣通史」梓行以後，民間迭有批評者，或謂此書之考證功夫；以老史家的眼光，以老法子編成；敘述涉外關係往往誤謬。（漢人，臺灣革命史，自敘）然若從雅堂所處時代背景論，亦未可厚非。誠如雅堂所言：「斷簡殘編，蒐羅匪易，郭公夏五，疑信相參，則徵文難；老成凋謝，莫可諮詢，巷議街譚，事多不實，則考獻難。重以改隸之際，兵馬倥傯，檔案俱失，私家收拾，半付祝融，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，以成風雨名山之業，而有所不可。」（臺灣通史自序）在如此困難情況下，雅堂效司馬遷，北遊大陸，入清史館蒐集史料，乃得成此巨帙，其任事之態度與宏偉之氣魄，較古之史學家，亦毫無遜色。至於撰寫過程中，所需面對的日本統治者所施之各種有形、無形壓力，更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矣！

於「臺灣通史」印行七十年後之今日來觀此書，雖未可說是完美之作，但仍爲研究近代臺灣史不可不參考之作，即雅堂有此著述已可不朽矣！

本土情操台灣語典

雅堂第二部於民族文化有重大貢獻之著作爲「臺灣語典」。民國十八年底，雅堂鑑於臺人在日本強勢統治之下，逐漸不用臺語，臺語日就消滅，故警覺到必須早日整理，以保存民族精神於不墜。乃於臺灣民報撰文，云：「今之學童，七歲受書，天真未漓，咿唔初誦，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。今之青年，負笈東土，期求學問，十載勤勞，而歸來已忘其臺語矣。今之搢紳士士，乃至里胥小吏，遨遊官府，附勢趨權，趾高氣揚，自命時彥，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臺語矣……余以僂民，躬逢此厄，既見臺語之日就消滅，不得不起而整理，一以保存，一謀發達……苟從此而整齊之，演繹之，發揚之，民族精神賴以不墜。」（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，臺灣民報第二百八十九號，臺語整理之責任）如此公然批評統治當局、批評搢紳、批評新銳知識青年，完全是爲了保存自己的母語、保存自己本土的文化，這種情操是令人敬佩的。

從民國十八年底至二十二年初，雅堂編臺灣語典至第四卷，即攜眷返回大陸，返國後雖仍致力臺語研究，旋以肝病，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，書遂未全帙。「臺灣語典」四卷，其卷一，釋單詞，凡四百餘詞，釋明出處，註記讀音及語音，且舉例以明其用法。卷二以下釋複詞，共七百餘詞，逐一解釋，兼明出處及讀音。觀此書內容，雅堂整理臺語已有相當可觀之成績，其保存臺灣文化及民族精神之作用與貢獻，絕不下於撰述「

臺灣通史」。可惜雅堂離開臺灣後，中日關係日趨綑緊，無人敢公然挺身宣揚，遂使此書淹沒不彰，十分可惜。除上述兩部專著外，雅堂尚輯錄明清二代有關臺灣詩作為「臺灣詩乘」，其餘論述散見報刊，後被輯印成專書者，有「臺南古蹟志」、「劍花室詩集」（含大陸詩章、寧南詩草、劍花室外集三部分）、「雅言」、「雅堂文集」等，論著之豐，實遠超前此之臺灣賢者。

六、結語

欲探索人物與事變之關係，連雅堂確為最佳的對象之一，彼所處之時代，為中西文化衝突最烈的時代，幼時接受科舉教育，長大面對著泛濫的西洋文明，他不斷加以吸收，又化為言論，指導其同胞，可謂能與時俱進。所處之政治環境，其複雜性更不可言，生於清朝，弱冠即遭亡國之痛，淪於日人統治，旋以文化使命感，遠遊大陸，瞭解祖國河山之壯麗與文明之偉大。及北伐告成，全國統一，雅堂即知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必為中華民族之大經大本，迥不願子孫再為異族之

賤奴，先命學有專精之獨子返國參與宗邦建設，再舉家終老首丘。

雅堂溫文樂天，處異族統治下，雖未武力相抗，卻致力保存鄉邦文化，發奮創為「臺灣通史」、「臺灣語典」，以今日眼光衡之，仍為不世之作，其苦心孤詣，仍值稱誦。

綜而言之，連雅堂生於富厚之家，身處衰亂之世，在異族統治之下，致力民族文化之保存，其人實已由傳統文人，而為一鄉之士，終為一國之士，亦足以不朽矣！



①連雅堂夫婦（右一、二）與長子連震東（左）在東京合影。

②連雅堂（右一）與友人吳世榮（中坐者）、白蘋洲（坐地上者）合影。

